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Politics and Sinology

内藤湖南

政治与汉学 (1866-1934)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

〔美〕傅佛果 著

陶德民 何英莺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Politics and Sinology

内藤湖南

政治与汉学 (1866-1934)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

「内」博佛果 著

「德」民何英莺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美)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8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

ISBN 978-7-214-10353-6

I. ①内… II. ①傅…②陶…③何… III. ①内藤湖南(1866~1934)—人物研究 IV. ①K833.13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1060 号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 - 1934 by Joshua A. Fogel

Copyright © 1989 by Joshua A. Fogel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2-075

书 名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

著 者 [美]傅佛果

译 者 陶德民 何英莺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责任监制 王列丹

装帧设计 陈 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插页 4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0353-6

定 价 5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

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中文版序言

时光荏苒，自从我研究内藤湖南(1866—1934)的生平与工作的著作首度问世以来，已经有三十年时间过去了。这本著作是在我于1980年完成的同题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关于日本与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但更重要的是，整个世界的中国研究已经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而这种景象在我写作的当时只能是止于憧憬而已。如今，不仅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学习日文并留学日本，而且这些新生代们已经在日本充分地感受到了学术天地的无限宽广。

当我在1970年代末期写作我的博士论文时，我不可能像如今的美国人那样，可以自由地来到中国访问，并利用中国图书馆的资料文献。这一切当然是因为冷战的缘故。缺乏接触中国学者、图书馆以及档案的客观因素，也是我选择研究日本的中国学的诸多理由之一。鉴于内藤湖南是日本最为著名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并且他的观点对西方学界的影响甚大，因此选择他的生平与工作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是一条便捷之路。

在1980年代中期，我开始访问中国并参加那里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一般而言，当时，内藤湖南的名字依然只是被当作批判导致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中国观时的一个方面而被提及。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从中国的前辈学者汪向荣处得到了鼓舞。他是我在第一次参加中国的学

术研讨会时认识的。这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而且会议的一部分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我提交的会议论文是有关其他题目的,不过我送给了汪教授一册本书的复印本。对此,他感到十分欣喜与赞赏。

几年之后,我应夏应元教授的邀请参加了另外一次学术研讨会。那时,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日文了,于是后来我也送给他一本复印本。在我们谈论内藤湖南的短短几分钟内,他曾附带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然,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当时我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在中国,内藤湖南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将享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这一点,从学者陶德民和钱婉约最近发表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明证。在我研究和写作本书的时候,日本对内藤湖南生平与工作的研究基本上存在着两条路径:其一是将湖南的政治观点视为帝国主义而加以谴责,并认为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其二是专注于湖南的学术创新性而忽视了他的政治观点。我试图克服这两种观点的偏颇。为此,我努力寻找在湖南的政治观点(在大量的新闻评论性文章中有着清楚的呈现)与其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我十分幸运地与湖南最后的以及最著名的一些弟子作了访谈,比如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以及三田村泰助等。他们对于自己的先生充满敬意与思念之情的回想,给我原本单调的理解增添了许多生动的色彩。

对于我而言,我最迫切希望的并不是中国的读者都能喜欢我这本书的中文版。毋宁说,我更加关心的是他们怎样去充分地认识书中的观点,以及书中对湖南是怎样逐渐形成其中国历史观的理解。比如,关于湖南最为著名的观点,即中国在中世就已经进入“近世”的观点,他们会有怎样的理解?不管对于西方学者,还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果能够不是出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国民之立场,而是出于作为个人的学者立场就学术观点交换见解,那么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此,我非常感谢陶德民和何英莺的工作。正是二位的翻译,使得这种学术交流成为可能。

英文原版谢辞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从空间性还是从时间性上来说,历史研究的对象都已经被加以细分。因此,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的时候必须依赖于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在写作本书的准备阶段,众多学者向我提供了他们的帮助,因此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他们。狄百瑞(Wm. Thodore deBary)是我写作这篇博士论文时候的指导老师,他不仅数次阅读了初稿,而且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给予我莫大的鼓励。詹姆士·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是最初给我写作内藤湖南这一题目以启示的人。卡罗尔·N. 格拉克(Carol N. Gluck)先生阅读了博士论文的初稿并向我提出了建议,尤其是关于明治时代部分的内容。此外,还有约翰·麦斯基尔(John Meskill)、黎安友^①(Andrew J. Nathan)、罗威廉(William T. Rowe)、大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孔飞力(Philip A. Kuhn)、柯文(Paul Cohen)、约翰·施瑞克(John Schrecker)、蒂莫西·维克斯德(Timothy Wixted)以及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各位先生,都在不同的阶段阅读了部分或者全部的原稿,并提出了十分有益的批评。数年前,曾经将内藤湖南的大作《支那论》当作教科书来指导我阅读的村上幸子

^① 黎安友(194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译者注

(Sachiko Murakami)先生,这次还精心地指导我怎样阅读明治时代的报纸。

当我访问日本之际,我的好友瓦特夫妇(Paul and Yasuko Watt)在京都扮演起我的“代父母”角色。在我们共同逗留于日本的一年半时间里,与鲍尔之间的学术性对话使我获益匪浅。他在日本方面的丰富学识以及对于慈云尊者的极富魅力的研究,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鼓舞的力量。

在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期间,指导我的老师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方面有着非凡造诣的竹内实教授。在他的介绍下,我得以见到内藤戊申、贝塚茂树和吉川幸次郎三位先生,并进行了采访。戊申先生是湖南先生的三男,贝塚先生则是湖南的高足,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方面的专家。吉川先生则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中国文学史的卓越见识,向我栩栩如生地讲述了1920年代中期京都大学的往事。现在是鹿儿岛大学教授的大谷敏夫向我介绍了湖南最为著名的得意弟子宫崎市定。宫崎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家中,向我讲述了他的“先生”的故事。我还要感谢对中国史上的各种问题都有研究的立命馆大学的池田诚教授。在他的介绍下,我见到了写作湖南传记的三田村泰助,并对他做了采访。

当时正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攻读学位的两位研究生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一位是井上裕正先生,现在是岛根大学副教授,专攻中国近代史。他与我成为了朋友,不仅向我介绍了京都大学的种种情况,而且还把我介绍给东洋史研究室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等。正是有了这些朋友的陪伴,使我能够在京都大学度过轻松愉快的留学生活。另一位是木田知生,现在是龙谷大学副教授。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留学两年半后刚回到日本不久,也与井上先生一样与我成了朋友。在1977年与1978年之交的秋冬时节,每逢周六午后,他总是在一个名为“进进堂”的茶馆里,花几个小时与我一起共同解读湖南著作中最为难懂的两部著作,即《近世文学史论》与《诸葛武侯》。木田先生在中国史和史学史方面有着令人惊叹的学识,我想他迟早会成为一位名扬海外的学者。在日本期间,我之所以能够取得超越一般学术交流的收获,主要是井上、木田两

位先生的功劳。

此外,对三重大学的北村稔、和歌山大学的河田悌一这两位先生对我所表现出来的友好与亲切,也深表感谢。我还要感谢热情欢迎我加入东洋史研究室这个小家庭的学生们,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江田宪治、岩井茂树和浅原达郎这三位。

我还必须感谢的是《书论》杂志的总编辑、京都教育大学的杉村邦彦先生。他将自己收藏的许多珍贵的湖南手稿介绍给我,同时还介绍我参加内藤湖南彰显会。下面我所列举的这些图书馆也是我所要感谢的,在我查阅未被全集收录的湖南的著作时,其工作人员在复印和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等方面给了我种种方便。

京都大学图书馆

岩手大学图书馆

立命馆大学图书馆

东京大学图书馆

明治新闻杂志文库

明治大学图书馆

日本国会图书馆

秋田县立图书馆

广岛大学图书馆

鹤舞中央图书馆(名古屋市)

东京都立图书馆

天理大学图书馆

冈崎市立图书馆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即将结束我的谢辞之际,我还想向苏珊·马戈利斯(Susan Margolis)女士表达我最深切的谢意,她不仅始终陪伴着我,而且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照。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尽管我得到了许多人和机构的帮助,作为执笔者,我是唯一一个要对本书内容负责的人。

1984年春于哈佛大学

所谓历史,就是从全人类的观点来理解的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命。 威廉·狄尔泰^①

(Wilhelm Dilthey, *Pattern and Meaning in History: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Society*, edited by H. P. Rickman, London, 1971)

※ ※ ※

所谓历史判断,不是认识的一种形态,而是认识的本身。这才是可能到达真正认识的唯一方法。 克罗齐^②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ans. by Silvia Prigge, London, 1962)

※ ※ ※

对我而言,所谓历史,就是所有可能有的历史,即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由各种职业的人们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来写而又写的历史的集合体。因此,在我看来,从这些历史中排他性地仅仅选取一种历史,才是对历史唯一的错误态度。 费尔南·布罗代尔^③

(Fernand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3-4, 1958)

※ ※ ※

所谓历史就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无穷无尽的对话。 E. H. 卡尔^④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London, 1961 [清水几太郎译,《什么是历史》,1962年])

① 威廉·狄尔泰(1833—1911),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② 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译者注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译者注

④ E. H. 卡尔(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学家。——译者注

导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陶德民

序 内藤生涯中的 1924 年

在内藤湖南(1866—1934)^①的学术及政治生涯中,1924 年可以说是

① 内藤出生于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字炳卿,名虎次郎。其父内藤十湾(明治维新后曾当选家乡的议员)因主张尊王攘夷而崇拜幕末志士吉田松阴(1830—1859),吉田的生年 1830 年为庚寅年,故吉田又名“寅次郎”。内藤生年 1866 年为丙寅年,十湾因而为之取名“虎次郎”,以与“寅次郎”相仿。见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东京:中央公论社,1972 年),页 33。“湖南”为其号,取意为家乡秋田县鹿角郡在风光明媚的“十和田湖”的南边。关于内藤的几种传记,可以说三田村泰助的《内藤湖南》最为传神。1909 年出生的三田村于 1933 年 3 月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毕业,在学时内藤已经退休,不过仍有幸受到内藤的指点和熏陶。他记得第一次访问内藤的恭仁山庄(该山庄是内藤从京都大学退休时建造的,位于邻接奈良的京都南部)是在毕业后不久的 1933 年 4 月 28 日,自那以后每周登门拜访一两次。秋天以后,因内藤赴满洲旅行和健康的关系,见面机会减少了,但仍被特许在藏有大量珍贵文献的书库中自由阅览。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机会,到 1934 年 6 月 26 日内藤去世为止,三田村干脆住在恭仁山庄附近。其传记中引用不少内藤在各个时期所写的书信,虽然简短,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据三田村的后记,本来传记的重点拟放在他所熟悉的内藤晚年的学问方面,但由于提供资料并予以指教的内藤长子内藤乾吉的建议,结果重点改到《内藤的家系》、《青年时代》和《活跃于报界》等几章,甚为可惜。题为《京都大学就职以后》的第四章,即有关 1907 年至 1934 年这 27 年学者生涯的部分只占到全书 224 页的 10% 左右,虽然前三章也涉及这一时期的有关事项。本文的意图在于依据近年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笔者涉猎的一些重要史(转下页)

与1899年具有相似意义的一个年份,因为它标志着另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

1899年春,一场大火烧毁了内藤在东京的住宅,把他长年辛苦搜集的五六千册藏书化为灰烬。当时的他已经是一名资深记者:三年前以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评点德川时代学术史的《关西文运论》(后以《近世文学史论》之书名出版)而名闻遐迩,后得到松方正义/大隈重信内阁的书记官长高桥健三(1855—1898)的信任而为之起草新内阁的政纲。前此,他曾为著名报人、哲学家三宅雪岭(1860—1945)代笔写作《真善美日本人》,也颇受圈内人士好评。两年前,他开始担任《台湾日报》的主笔,为殖民当局出谋划策,受到重视。未滿一年,他便回日本探望身患重病的同乡、同学、同事,更是同志的畑山吕泣(1866—1898),最后又为之送葬。这是因为两人有过患难与共的经历:1892年畑山因在报刊上揭露专制政府干涉选举而被监禁三个月,那时内藤本人也因主持正义而被刑警盯梢达数十日之久。后来内藤也曾有过竞选议员以从政的念头,但是审时度势之后放弃了。他对1898年清国发生的戊戌变法表示关心和同情,以后与流亡来日的梁启超(1873—1929)也有过接触。^①

1899年秋,内藤在友人的资助下第一次访问清国,结识了严复(1854—1921)、文廷式(1856—1904)、张元济(1867—1959)和罗振玉(1866—1940)等第一流学者。从此,他矢志于中国研究,一反日本汉学界的旧习,开创了深入实地考察史迹及重视采集原始史料的新学风。归国后发表的游记《燕山楚水》(又名《禹域鸿爪记》,书后附有其关于中国的报刊论说)为他赢得中国问题专家的名声。后来因为自告奋勇于1905年夏(即日俄战争后期)赴日本满州军占领下的奉天地区作民政调查,而

(接上页)料,对作为民间意见领袖的内藤晚年的东方回归现象作一概观,厘清其政治立场及学术主张的脉络,以为今后的深入讨论提供一个基础。

① 据泽村幸夫的回忆文章〈内藤湖南と梁启超〉,泽村在1903年造访京都寺町的内藤家时,看到过穿着一身中国服装的梁启超。泽村幸夫:〈内藤湖南と梁启超〉,《支那》第27卷第2号(东京:东亚同文会,1936年2月),页53—58。

得到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1855—1911)的赏识,被紧急电召去北京,为与清政府谈判缔结“东三省善后条约”出谋划策,从而更加著名。^① 结果终于在1907年破天荒地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占据东洋史的一个讲席。在审议他的聘用案时,文部省的主管官员曾对极力保荐他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长狩野亨吉(1865—1942)表示,请一个只有秋田师范学校毕业资格的人担任帝国大学的教授,即使他有孔夫子那样的才学,也难以照准。狩野愤而拍案,不惜辞职抗争,最后才达成妥协,即先聘为讲师,两年之后转为教授。后来证明,内藤的到任给京大的东洋史学带来极大的活力,使之足以与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相抗衡。

如果说,1899年标志着内藤由一个新闻记者转而成为一个支那学者的起点的话,1924年则是他由执着于近代西方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的立场转而质疑并挑战之,企图回归东方的文化及政治传统。

当时58岁的内藤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其学术更加炉火纯青。三年前,他在《支那学》杂志上发表《章实斋年谱》,引起了胡适(1891—1962)的注意。不久,胡适从北平寄来自己编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致谢。^② 两年前,他在史学地理学同攻会上作题为《关于应仁之乱》的讲演,引起日本国史学界的震动。一年前(1923年),他开设“支那绘画史(五代以后)”课程,并在《历史与地理》杂志上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③。因

① 参照陶德民:〈内藤湖南の奉天調査における学术と政治—内藤文库に残る1905年笔谈记录につい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1号(2006年3月),页131—143;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明治の汉学者と中国—安绎・天因・湖南の外交论策》(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的第4章〈日露战争前后的满州经营论〉。

② 参见陶德民:〈内藤湖南における进步史观の形成—章学诚『文史通义』への共鸣〉《アジア游学》第93号(2006年11月),页203—216。

③ 有关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参见 Hisayuki Miyakawa, “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4 (Aug. 1955): 533—552. 该文作者宫川尚志为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出身,在文中提到内藤的第三个儿子、在爱知大学执教的内藤戊申认为,内藤“唐宋变革说”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深受德国哲学家 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影响的丹羽正义所提供,其次才是章学诚。近年有关这个问题的鸿篇巨制为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收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卷,页5—71。

境地带则会开出文化之花,人才也会从边地辈出。这样,反而会从边境影响中央。日本等是中国文化圈东端的一个国家。从这个观点看,也可以把日本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①

归国十个月后,内藤于1926年(即大正末年、昭和元年。同年12月改元)1月上旬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关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反对礼赞欧美文明》一文,以发表他的游欧观感和东西文化文明比较论。

近代文明虽有以工业的进步作为标准来衡量国民水准的倾向,但这绝不是正确的见解。以批量生产为主体的工业有磨灭人类个性的倾向,故这并不符合人类真正进步的主旨。最终,能够满足个性要求的工业必将兴起。而工艺作为其中间产业,最后必将导致工艺的手工化。^②

(在见过巴黎各处精美的雕刻后)伦敦市内各处的铜像、石刻等之拙劣和马虎令人吃惊,远不如日本在这方面有希望。在看了博物馆等以后,更觉得日本在古代雕刻等方面要优秀得多。由此,不禁产生了对英国国民的侮蔑之念。特别是当时温布利在开英联邦博览会,……就今日生产的日常手工艺品来看时,印度不用说,缅甸等国的生产品也有不少蕴含着英国人不可及的艺术趣味。由此,对英国人统治印度这样的文化古国到底是否合理一事也发生了疑问。^③

与此(依靠占有大量殖民地和天然资源而富强的英美)相比,日本可谓处于非常不幸的位置,缺乏天然资源,占有的殖民地也不值一提,而必须单靠国际贸易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致富。尽管如此,我却为这日本的贫瘠而礼赞。虽然今日在欧洲没有可与英国之富强相比肩的,但倘若英国就此灭亡,那它到底为世界文化做出了何

① 松本信广:《在巴黎的内藤先生》,《全集》,第10卷,附录《月报》第2号,页7。

② 内藤湖南:《民族的文化と文明とに就て》,《全集》,第8卷,页147。

③ 内藤湖南:《民族的文化と文明とに就て》,页142。